

目 录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的讲话·····	邓力群(1)
新春的反思·····	《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24)
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姚雪垠(34)
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线·····	熊 复(60)
评“真正的言论自由”论·····	李敏生(8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	陈先达(91)
马克思的论断和社会主义的现实·····	有 林(105)
治本三题·····	史美珩(126)
五四文化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提纲·····	韦 骥(134)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大思想武器·····	陈瑞生(148)
与《国有财产个人化》作者商榷·····	宗 寒(156)
驳否定全民所有制的三种观点·····	智效和(167)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三题·····	高宝钧(181)
真理多元论的谬误和危害·····	田心铭(201)
论政治多元化的本质和虚伪性·····	金 重(219)
批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	韩树英(237)
杂文也是石头	
——《新观察》一察·····	马畏安(241)
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张启华(247)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	何建幸(285)
动乱、暴乱的实质、根源和教训·····	华 明(289)

同青年朋友们谈谈认识动乱性质的方法论问题·····	郑 舍(298)
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	罗国杰(306)
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	
——评严家其的《首脑论》·····	李敏生(317)
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胡 钧(329)
充分估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及其危害性·····	华 超(338)
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吴大英 李延明(345)
民主问题 ABC·····	邱敦红(370)
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	卢之超(383)
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	余心言(396)
评“个人本位主义”·····	许启贤(425)
是劳动者共同所有，不是无人所有·····	李光远(436)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谷春德(449)
从“白皮书”到《河殇》·····	戚 方(469)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王忍之(481)
怎样看待中国的“穷”·····	高 狄(505)
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传统·····	敏 泽(516)
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	
·····《当代思潮》杂志评论员	(528)
他们到底害了什么病？·····	魏 巍(533)
一元·二元·多元·····	程代熙(536)
论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兼评“人人皆有的私有制”·····	王正萍(548)
我国法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张友渔(554)
评胡绩伟“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林 枫(567)
对文艺的非理性主义的理性审视·····	陆贵山(584)
文学与人民·····	刘白羽(594)

多元化与自由化·····	李 征(602)
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究竟提供什么“启示”? ·····	郑志晓(616)
评意识形态“多元化”等观点·····	春 阳(633)
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姜广庆(653)
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	许征帆(662)
剖析新“魔力圈”的几件“法器”·····	唐克俭(670)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兼评胡绩伟关于党内应当“形成不同派别、	
不同路线”的观点 ·····	雄树刚(694)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阶级斗争问题, 坚持人民	
民主专政, 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有 林(704)
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哲学基础·····	濮良贤(718)
从历史和现实看美国民主的实质·····	张海涛(726)
也谈“球籍”问题	
——兼论“忧患意识”、“危机感”·····	吴建国(738)
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	卫兴华(750)
试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轨迹、根源和教训	
·····	杨发民(757)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赵家祥(770)
关于“和平演变”的几个问题·····	黄美来(783)
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命运的问题	
——评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实质 ·····	董学文(807)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会上的讲话

(1987年2月26日)

邓力群

我的发言准备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年会是布置工作的会议，也是研究问题的会议。

宝华同志和瑞环同志在会议开幕当天发表了很好的讲话。同志们认为，应该按照这两个讲话的精神，来进行今年研究会的工作。我同意这个意见。会上，天津同志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介绍了他们今年贯彻执行中央一、二、三、四、六号文件的一些打算，大家都认为很好。小组会对于今年年会工作的讨论，也是围绕宝华、瑞环同志的讲话进行的。大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许多意见，很值得重视。

蒋一苇同志在大会上有个发言，不少同志同意他的意见。他从理论上进行的探讨和提出的见解，还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他的发言涉及范围相当宽，除了企业的工作，还包括企业的领导和若干制度问题。我们是一个研究会，这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不强求一致，也不必做什么决定，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问题本身也确实需要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复探讨、继续研究。有时候，少数人的意

见，最终可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这个研究会，以至于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研究会、讨论会，都应该保持和发扬这种民主探讨的风气。但是，正在探讨中的问题，有些可以见诸报刊，有些就不要急于见诸报刊。比如，党和国家已经做出的决定，一定要坚决执行。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在坚持执行的前提下允许保留，但是不允许在报刊上公开宣传。向上级反映，在内部讨论中发表自己探讨性的意见，应该受到保护。在公开报刊上发表消息、发表论文，需要慎重。特别是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请各报刊和各地研究会的负责同志好好掌握。公开发表和内部讨论，要有所区别。这有利于我们活跃思想，又不至于造成混乱。

第二个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本，也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立会治会之本。

小平同志经常讲，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从毛泽东同志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都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两条。对于这两条，小平同志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在不同场合，有的时候侧重多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有的时候多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好比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着重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这个角度来阐发。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一样，小平同志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而且反复进行了具体深入的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同志常常提出一个问题，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或者说多种经济成分，也说多种所有制形式，是不是可以说得通。关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也需要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允许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

业、外商独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这几年，各地城乡都出现了不同数量的雇工。雇工数量在国务院规定之内的，允许存在和发展，超过规定的，看一个时期再说。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个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中外合资，一半是资本主义，一半是社会主义；外商独资企业，是国家可以监督的资本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又有一些过渡性的、混合的经济成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我们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这是长期的方针。说其他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在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有助于生产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多种要求的。但是怎样使它们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呢？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好经验，需要总结、提高、推广，当然也还需要继续探索，创造新的经验。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各种经济成分之间，需要有一种合理的调节，使之达到合理的配置，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合理配套。也应该看到，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企业，不会自发地、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需要有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要通过这些方针、政策、措施，使它们存在并得到发展，又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措施，有些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配套，有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制定。

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经常遇到一个问题。这几年来职工生活确有改善，可是他们还是有很多意见。一个经常说起的事实根据是：有些个体户到国营商店买点什么，倒卖一天就拿到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他们问，这样的人，贡献真的比职工大吗？这样的分配能叫合理吗？这确实是个问题。怎样解决呢？决不能回过头去不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要让它存在、让它发展，

又要有相应的政策、法律，包括税利调节分配的办法等等，以保证它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需要继续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实际上，目前发展得还很不够。1985年有个数字。个体、公私合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全社会总产值的2%左右。要向职工讲清楚，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人口那么多，需求是多方面的，什么东西都要全民所有制经济包下来，不可能。加上集体所有制，也解决不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对整个国家和人民是有好处的。当然，政策、措施也要力求逐步完善起来。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一点问题就否认这样一个总的方针、总的部署，更不能回过头去走老路。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今年2月18日小平同志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有一个重要谈话。

小平同志说：“我们一些娃娃、大学生闹事，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当中大半是毫无经验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主要不是学生，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主要涉及到的是：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个问题没搞清楚。我们干的是什？‘四化’。人们都说‘四化’好，但忘了什么是‘四化’。他们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存在这种斗争，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这种斗争。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是斗争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他们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本世纪内实现了‘小康’社会，

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下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最终说服他们，他们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现在看，我们实现确定的宏伟目标有希望。”

小平同志又说：“这些年总的发展情况不错，国家情况好，人民生活确实逐步提高。”“学生闹事，使我们的决心更加强了。当然，也提醒我们自己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这几年的发展经验说明，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这几年的发展也带来些消极因素。学生一闹，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不良社会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坏事变好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从而解决问题。中国有个最大的特点，即‘文革’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要教育我们的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我们的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而他们提出的理想与我们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中国从鸦片战争起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一个半世纪以来，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寻求中国的出路，开始就是想全盘西化，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的西方。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的西方不行了，开始提出‘以俄为师’，即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统治又导致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中国继续贫穷下去。我们年轻人往往忘记了这个历史。这些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

温饱也没有保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我们要用这些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总之，还要花十几年向青年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下个世纪还要用三、四十年教育青年。告诉阁下和朋友们：我们对发展充满了信心，同时也认识到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丧失警惕，斗争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注意经常总结经验。”

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对于全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尤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认真领会，按照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要求，把我们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第三个问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

两个基本点是互相统一的。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有一个方向问题，我们要使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因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意见都非常重要。

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我们讲建设、改革、开放、搞活，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口头上也讲改革、开放、搞活，但是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想把改革、开放、搞活等现行政策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主张为资本主义平反，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来一个全盘西化，按照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造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如此等等。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把四项基本原则和建设、改革、开放、搞活统一起来，他们却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这里，原则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建设、改革、

开放、搞活。对于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讲改革、开放而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的主张，需要进行批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界限，就是决不能把坚持建设、改革、开放、搞活中的探索乃至失误，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定要坚持建设、改革、开放、搞活。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改革、开放、搞活都还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经验要逐渐积累，政策的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经过仔细调查后提出的意见，也可能不尽准确。在实际工作中，也免不了出现某些失误，免不了出现某些漏洞。因此，必须把这种情况同那种把改革、开放、搞活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格地区别开来。

中央四号文件要求不涉及现行政策。这个规定，就是充分考虑到上述情况做出的，因此是完全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些具体政策经过实践检验，或者出现了新的情况，还需要修正、完善乃至重新制定。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伸到这些方面，就会束缚我们进行建设、改革、开放、搞活的手脚，就会造成思想混乱。

严格区分政策界限，是保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致半途而废，能够健康地长期地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同志反映，个别企业领导同志看到有的职工不守纪律，或者有点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包括自由散漫呀，说点怪话呀，就说，你们可不要搞自由化。有的职工就回敬说，你们搞不正之风，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互相把对方的毛病，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同那些别有居心的人完全不同。但是也确实说明，严格区分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次斗争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重要保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十分谨慎，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办事。我们搞研究工作的同志尤其要头脑清醒。我们同第一线的同志有点不同。他们天天忙得不得了，我们

终究处在第二线，有些问题可以多调查、多研究，把界限划清楚、划准确以后，再来发言。

第四个问题，学习中央文件，回顾历史经验，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集体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深远意义，站在斗争的前列。”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以后，在中外读者中反应很好。征得小平同志同意，经他审定，正在出增订本。原来三万多字，现在八万多字，一直收到他最近的讲话、文稿，公开发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了一本书，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收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有关文件、决定和小平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第三本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六十多万字。三本书合起来一百多万字，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大题目的重要文件的选编。这三本书同时学习，显然不可能。按中央通知要求的精神，还是先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大学里头，也提倡组织学生特别是教师好好学习。这对于统一认识，分清是非，会大有帮助。书出来以后，中央宣传部准备发一个通知，至于如何组织，主要靠地方党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是今年一年的大事之一。可不可以设想，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间，就以这两本书，加上中央今年已经发出的以及还将发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作为党员和党员干部学

习的主要文件。上面两本书中所收文件、讲话，很多同志都看过。可是看过以后，工作一忙，对其中讲些什么，现在可能没有印象了或印象不那么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现在，中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彻始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是究竟讲了些什么，有些同志可能缺乏历史的、完整的、准确的了解。认真读这几本书，可以在这方面提高我们的认识。学习要结合实际，结合自己的工作。

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希望大家都来回顾一下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八年的历史经验。学习文件的同时，结合当前的实际，回顾过去的历史经验，会加深我们的认识。我们这八年，是成功的八年，胜利的八年，不断前进的八年。我们有大量的正面经验。当然在这中间也有某些失误的教训。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这个话讲得很深刻。犯了错误，得到了痛苦的经验，可以由此提高。所谓犯错误的经验，不只是自己犯错误的直接经验，也包括别人犯错误的间接经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一直头脑清醒？别人犯错误，我们顶住了没有？有的时候，原来以为是对的，一个气候一来，自己也怀疑是不是对，因此也难免受点影响。回顾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的提高觉悟，会有切实的帮助。

讲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早、讲得最多、讲得最深刻的，是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讲得最多、讲得最深刻的，也是小平同志。同样，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小平同志自己说，他讲得最多，也最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年的实践越来越证明，历年中央的决定和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小平同志所说那些党内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议论，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是站不住脚的，需要进行批

评，使大家认识它错在哪里。

1979年，小平同志重申和全面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根据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小平同志就关于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有几次重要讲话。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又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问题决议，六中全会以后又有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小平同志1982年4月提出“四有”，7月提出四项政治保证，接着召开了十二大。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讲话的两个题目，一个是整党不能走过场，另一个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5年，有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又有紫阳、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中央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小平同志发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年底又有关于学生闹事问题的重要讲话。然后到1987年，中央连续发出几号文件。

有同志说，我们这些人老在唱四季歌，一次又一次地说，思想政治工作的春天来到啦，也按着中央的精神做了工作，结果做着做着，就遇到阻力了，做不下去了，秋天就来了，然后中央又出来讲话。应该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党中央是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但是，这几年间有起有伏，也是事实。经过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越来越厉害，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到了去年学潮，尽管参加的人数不多，可是就所提出的政治问题的尖锐性来说，建国以后从未有过。不少地方出现了反动标语口号，一些大字报、小字报，用刻薄的语气、尖酸的议论，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人民民主专政，把社会主义道路，统统给否定了。有的公开说，把“老马”从中国赶出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要一本书有个“马”字，那就危险了。

《马氏文通》都当做抓人的证据。蒋介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确实是切齿痛恨、要斩尽杀绝的，当时的反共报刊，不断地进行煽动、制造谣言，宣扬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我们努力干社会主义，可是在我们的学生中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把马克思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把“老马”从我们思想理论战线赶出去。先是有的文章提出，接着不少地方转载，通过大字报、小字报、游行口号加以传播，说现在要推翻新的“三座大山”，一座叫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座叫做毛泽东1957年以来的言论；一座叫做变相的一国两制。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越来越泛滥？回顾历史，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很有好处。只是正面教育不行，还必须要有反面教育，才能够更完全、更深刻地认识真理。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思想战线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揭露、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批评“两个凡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是赞同的，思想战线的同志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到理论务虚会后期，就发生了思想上的重大分歧。比方说，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理论，说我们不该那么早搞社会主义改造，有的主张补资本主义课。有的把“四人帮”和党的领导混为一谈。有的提出停止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至于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列宁主义也不要再提了，只提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议论集中到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稍早一点，有西单墙的大字报，提出要民主、要人权，甚至请求卡特支持中国的所谓“人权运动”。小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是“踢开党委闹民主”。有些共产党员专门写出报告支持西单墙。在这个情况下，小平同志讲了一篇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那个时候，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魏京生不仅是西单墙的话跃分子，同时给外国人送军事情报。广大干部、工人、职工看到西

单墙那些议论，纷纷表示不满，有的和贴大字报的人面对面地进行争论，批驳他们。小平同志及时地、鲜明地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稿子出来以后，曾经征求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同志的意见。理论界、文艺界一些同志不赞成，有的提出了自己的修改稿。理论界也有同情魏京生的。小平同志讲话中说到，中央对我们一部分理论工作者表示失望，他们辜负了党对他们的期望，很委婉地进行了一些批评。正式下发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四项基本原则一提出来，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若干人就不满意。有的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有什么区别呀！有的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条棍子，或者说可以变成四条棍子。小平同志讲话中说，希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分别写小册子、写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同志讲，谁要写这样的文章，谁就先臭掉。当时已经有这样一种空气，谁要出来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就遭到围攻、遭到冷眼。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还有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上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叫“说三道四、左右为难”。有同志说有了三中全会就行了，为什么还来个四项基本原则？另外一些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是三中全会方针的发展，针对当时理论界情况，需要讲四项基本原则，而且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说三道四”之争，争了好几年。“左右为难”，是说三中全会是反“左”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的。争论了一、二年，至少在全国性报纸上，基本上没有积极宣传、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小平同志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报纸连续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有同志提出意见，后来一篇换了个题目，实际上还是原来的思路。乔木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说，这样的文章，用意另外的方面。这些文章在作者所在单

位也引起了争论。同志们批评这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引导人们来怀疑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作者不接受，坚持自己意见，后来出了一本书，书名就是“我们坚持什么”。

尽管有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论务虚会后期出现的一些争论还在继续。争论的中心问题，还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些报刊一再提出“政治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不仅要求给各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以发表自由，甚至还主张给反革命的言论以发表的自由，反对所谓“以言治罪”，为社会上一小撮害群之马辩护。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受到批评以后，有人发表文章反对这种批评，居然认为提出文艺家要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社会效果就不好。在这同时，报刊文章也出现了其他错误提法。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修改宪法，取消了“四大”的条文。

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同志提出，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小平同志在他的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专门讲了宣传战线的工作，指出宣传工作的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他说，要教育全党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并且严肃地指出，有人竟然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大公无私”等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没有受到应有抵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支持和同情。

到1981年1月，中央做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国务院又于2月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就是一律取消、禁止。有的同志曾经主张，吸收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为作协的团体会员。有的同志说，就叫它自发组织、自发刊物。也有同志设想，这些刊物是否可以通过登记

的办法加以控制。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叫它非法组织、非法刊物比较合适。关于通过登记的意见送到陈云同志那里，他不赞成，说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你只要允许登记，他们就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你，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一律禁止。

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稿的过程中，同样有很大的争论。党内讨论，应该提倡和允许各种各样的意见充分发表。党中央、小平同志反复做工作，讲清道理，决议中要写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问题，终于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决议，得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的拥护。我那时去河北传达，才知道一个情况，决议下达以前，连在省委机关的一些同志，都有人误认为，社会上一些贬低毛泽东同志、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是得到小平同志支持的。为了澄清混乱，我们把小平同志历次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把小平同志批评那些贬低和想要取消毛泽东思想的人的讲话，特别是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重要讲话，一次一次地如实告诉大家。这样，同志们才恍然大悟，认识到小平同志是维护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是维护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恰当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对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分析是非常公正的。经过党内的争论，经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学习和宣传，使得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舆论，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中没有市场了。

1981年出现一个电影《太阳和人》，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剧本原名叫《苦恋》。首先是军队同志提出意见。小平同志看了，认为不管作者动机如何，片子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剧作者是军队干部，是党员。所以小平同志问：党性哪里去了。小平同志指出，不能上映，而且要组织文章批评。《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批评是应该